

序

黎红雷教授自获得管理哲学专业博士后，短短 10 年间，已经出版了五六本有关中国管理哲学的专著。他的每一本书都能够发挥中国管理哲学精神和揭橥东方管理智慧，尤其在儒家管理哲学方面可说已深得个中精髓。最近，他又在新加坡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的邀约下写成了《人类管理之道》这一本大著。这不仅是对管理哲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而且可说是借中西管理哲学的比较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与哲学。

红雷为学的最大长处是善于会通、精于组织。这一长处可说在他这本新著中得到最大的发挥。在此书中他借着“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的分别讨论了中西两大文化传承的差异与人类管理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而由于科技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寻根与认同。此处所谓的文化显然不应只指地区性的或多元性的文化观念与行为，而应更是指能够容纳与会通科技与人文价值的文化智慧。哪一个文化能够融合及会通科技与人文价值 哪一个文化就是智慧 因而可名之为文化智慧或智慧文化。在这一个“文化人”的管理智慧中 无可否认的“政治人”的权力欲与“经济

人'的财富欲自然仍将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角色。但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文化的融合与会通作用，人类社会的管理将永远不可能超越权力与财富的追求而获得道德与正义的进步。

红雷对 21 世纪的管理理念作了极好的发挥。他从变化管理、创新管理、整体管理与和谐管理等方面探讨了 21 世纪人类文化管理的理想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人类最后追求的正是这四种根本的宇宙价值与人文价值 变化、创新、整体与和谐。红雷并因之论述了管理的变化性、创新性、整体性与和谐性。这些概念我在《C 理论》一书中已经涉及 但现在经过红雷深入与清晰的分析与阐述，可说已为中国管理哲学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深庆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国内已有传人，同时更为中国文化的复兴灿然在望，而感到欣慰。

多年来 红雷一直与我保持着经常的学术联系 更由于我在中山大学长久的讲学关系，红雷与我联合招收了多名中国管理哲学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为国内管理哲学人才的培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如今红雷又写成了这部兼含古今中外管理学术的好书，后学者其庶几兴起乎！

成中英序于檀香山寓所、大生不息斋

公元 2000 年 2 月 12 日

引 言

管理是人类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管理活动的历史，同人类本身的存在一样长远。大概在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以捕获别的动物作为谋生手段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定的组织和管理活动。然而对于管理活动的自觉、管理经验的总结、管理思想的形成，则是在人类有了文字记载以后的事情。

人既是管理活动的主体，又是管理活动的客体。因此任何管理思想的提出，都离不开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而人类不同时代对于自身本质的认识，则标志着那一时代管理活动的着重点。质言之，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是我们划分一定管理时代的依据。

人类对于自身本质的认识，同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政治”、“经济”、“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三大领域，与此相联系，“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则是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三种认识。

2000 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是政治的动物”，揭示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

200 多年前，英国学者亚当·斯密认识到“人是经

济的动物”开启了人类管理史上的‘经济人’时代；

今天 在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 人们认识到‘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们进入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文化人’时代。

“温故而知新”。在新千年降临之际 探索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包括‘道路’即人类管理经历的过程 以及‘道理’即人类管理秉持的理念 这对于提高人类管理活动的自觉性，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 篇

“ 政治人 ”时代

引言“政治人”假设 及其管理智慧

“政治人”，这是人类对于自身本质的第一个认识。不知是必然还是偶然，公元前 3—4 世纪，在地球的两端——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几乎同时有思想家达到了这一认识。此后两千年，“政治管理”成为人类管理的主要形式，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遗产。

亚里士多德

距今 2300 多年前，古希腊有一位大思想家，对于人类的本质作了深入的思考，破天荒地提出“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由此而揭示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

这位思想家就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年），他是柏拉图的学生，而柏拉图又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本人也办学授徒，他的学生中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后者曾远征波斯和印度，打通古代东方与西方的联系，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洲大陆的庞大帝国。

不过，亚里士多德本人似乎并没有受到他这位高

足的军事活动所造成的世界新局面的太多影响。他所潜心研究的课题是当时希腊的“城邦政治”。古希腊的“城邦”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城邦生活就是一种政治生活。实际上今天欧洲语言中的“政治”(politics)一词就是古希腊“城邦”(πολις, polis)一词的衍化。

亚里士多德当时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人类为何一定要过这种“城邦”(“政治”)的生活？他提到互相依存的两个生物必须结合，其种类才能得到延续，在这点上人类与其他动物甚至是植物都是相同的。在人类，这种结合的形式就是家庭。但人类并不到此为止，在家庭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个家庭联合组成村庄，再由若干个村庄联合组成城邦。这时，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说，城邦的形成是出于人类生活的自然发展，其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人类过上“优良的生活”。

“城邦”是自然的产物，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体现了自然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写道：

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6。)

这后一句话，按其本义，也可译为：“人类在其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就是后人广泛引用的

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的蓝本。

接着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探讨 作为动物 人类为什么比蜂类或其他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呢？答案就在于人类有语言和理性。有了理性，人类就可以辨认识物的善和恶、正义和不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 有了语言 人类就可以把这种理性的认识互相传达 有了语言和理性 人类就可以形成思想上的共识，进而结成政治上的共同体——“城邦”。

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 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9 页。）

在城邦这样的政治组织中，由谁来进行管理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 轮流执政。根据他的设想 城邦中的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依据公正的原则，全体公民都应当参与政治，实施管理。在同一个时间里，一部分人统治（管理），另一部分人接受统治（管理）执政者应该轮流退休 并且在他退休以后同其他公民处于同等的地位。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的管理原则。

荀况

无独有偶，就在亚里士多德建构自己的“政治学”体系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古代的中国，也有一位学者对诸如人、社会、国家、政治、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得出与亚里士多德异曲同工结论。

这个人就是荀况（约公元前 325—公元前 238 年），他尊孔丘为师，以宣传和发扬儒学为己任。但他的一个学生韩非却成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另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得力助手，后者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中国。

同亚里士多德一样，荀况对于政治管理问题的研究，也是从认识人类的本质开始的。他把宇宙一切物质存在的基础统称为“气”，认为水火有“气”却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却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却没有礼义。人类有“气”，有生命，有知觉，又有礼义，所以人类是世界上最高贵的物种。人类的力气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牛马却为人类所役使，这是什么原因呢？荀况写道：

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

在这里，荀况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都强调了人类的“合群性”。不过对于形成“合群性”的原因，二者却稍

有不同。亚里士多德突出了语言和理性的能力，而荀况则似乎更钟情于礼义的作用。虽然，荀况在另一个地方也谈到了人类的理性分辨能力，并以之作为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但最终还是把这种分辨能力导向了人伦秩序的分别：

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荀子·非相》）

既然人人都具有人伦秩序的分辨能力，那么在理论上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政治组织的管理者。荀况正是这样论述的。他以传说中的古代圣王禹为例，认为一个普通的人也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人。为什么呢？禹之所以成为圣王，是因为他实行礼义法制，而礼义法制是有着可以懂得、也可以做到的道理的。任何一个人都具有可以懂得与可以做到礼义法制的素质和条件，只要他照此道理去做，就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人，成为社会政治组织的管理者——即使不一定有禹那样高的地位。

一个人在社会政治组织中的地位——统治（管理）别人还是接受别人统治（管理）取决于个人掌握礼义法制的程度。对这一程度进行测试并依据测试的成绩选拔任用官吏，这便是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基本原理。“科举制”从制度上解决了行政管理人员的选拔和

补充的问题 对于近代英国实行的‘文官制度’影响甚大 而‘文官制度’正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蓝本。

法治与人治

在政治管理中 主要依靠法的作用“法治”还是依靠人的作用“人治”)这是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重大区别。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从其师柏拉图的‘理想国’起步的。按照后者的设想 最理想的国家 其管理者应该是‘哲学王’——具有哲学头脑的国王或者当上国王的哲学家。这种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比起呆板的法律条文来，更能有效地治理好国家。

主张‘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 并不盲目追随老师的呼吁，而把注意力放在被老师所忽视的‘第二等理想的国家’——“法制国家”上 集中分析了‘法治’与‘人治’的利弊。

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强调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观点 即在任何最理想的国家里 最高统治者必然是法律而不是任何个人。主张君主政体较为有利的人并不否认这一点 只是辩解说 法律只能订立一些通则 当国事演变的时候，法律不会自动发布处理各种事务的号令；所以最终还是要依靠君主个人来治理。

对此 亚里士多德反驳说 任何统治者的心中都存在着一一定的法律通则。诚然，法律所未及的问题或法

律虽有所涉及但并不周详的问题确实是有的。这时候既需要运用理智那么应该求之于君主一人抑或求之于全体人民？君主一人之力明显不如众人之力，君主一人之智明显不如众人之智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个人更有可能作出较好的裁断并且，物多者不容易腐败，单独一个人做决定容易受情绪左右而失去正确的判断能力而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判断错误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按照自然的本质人人都具有同等的价值那么就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同等价值和权利的人拥有同等的权力，交互做统治者也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

可是，这样的结论就是主张以法律为治了；建立（轮番）制度就是法律。那么，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167—168 页。）

当然，亚里士多德也并不完全否认“人治”的作用。他肯定，执法者可以依据法律精神解释并应用一切条例对于法律所没有周详的地方执法者可以在遵从法律精神的前提下，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的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美。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执法的灵活性但在立法上却堵死了“一人之治”的漏洞。总的来看亚里士多德强调“法治”高于“人治”。

荀况对“人治”与“法治”也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最

终却得出了与亚里士多德相反的结论。

在荀况看来 只有自觉致治的人 而没有自动致治的法。他举例道：古代著名射手羿的射箭方法没有失传 但并不是每一代都有像羿那样善于射箭的人 夏朝的缔造者禹所创立的法律制度都还存在，但并不是每一代都有像禹那样英明的君王。历史事实是：夏朝最后一个君王桀荒淫无道 因而被商朝所推翻。由此 荀况得出结论：

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 不能应事之变 足以乱矣。（《荀子·君道》）

荀况心目中理想的治国者，是那些充分发挥人的本能 掌握礼义法制的“圣人”。这样的人 能够用礼义约束自己的行动 以法律作为处理政事的准绳 阴察秋毫，能依据时势的变化而采取应对的措施——这才叫做掌握了政治管理的根本。这样的“圣王”，上接于天，下达于地，充溢于整个宇宙之间，作用于世间万物之上。他们的作用似乎隐微却又明显，似乎短暂却又深长，似乎狭小却又广大，真称得上是智慧博大的统治者 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相比而毫不逊色。

但是 荀况的学生韩非对此却有异议 哪里去寻找这样十全十美的“圣王” 如何去推行这种完美无缺的

“人治”韩非的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以“霸王”取代“圣王”以“法治”代替“人治”。就立法而言韩非主张君主专制，理想的治国者不再是智慧的化身而只是权力的化身，他独断独行，依靠法令、权势和权术进行管理，实行“一人之治”。但就执法而言韩非却强调法律的权威，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很有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这种“人治”与“法治”相互交错的局面，正是古代中国政治管理方式的写照。

尽管荀况师徒之间、亚里士多德师徒之间，以及这两对师徒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但他们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共同揭示了古代政治管理的实质。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荀况本人，第一次点明了人类的合群性和政治性，从而揭示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他们的思想分别影响了整个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的社会管理格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管理遗产。

第一章 欧洲的管理智慧

实际上，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并不在欧洲。目前公认的人类古代四大文明是：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每一个至少都有 5000 年以上的历史。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都在欧洲的东面。按距离的远近，被欧洲人分别划为“近东”、“中东”以及“远东”地区。

欧洲文明的起源，是形成于公元前 8 世纪而兴盛于公元前 4—5 世纪的希腊文明。它虽然是后起的人类文明，却以理性的态度、智慧的精神，塑造了欧洲的文化品格，并由于继承者的发扬光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都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管理文明，自然也毫不例外。因此，我们回顾人类的管理遗产，还是要从欧洲讲起，从希腊讲起。

古希腊罗马时期

对于希腊人的非凡成就，一般有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在欧洲的南部，离埃及和巴比伦很近，接受到这两大古代文明中心的辐射，具有所谓“后发文

明”的优势。其次，就是希腊人在长达几世纪的时间里保存了独特的城邦制度，为文明的繁荣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城邦制度

其实，城邦并非古代希腊所独有。它是人类社会最早从原始公社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普遍的管理组织。但是，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非洲，在欧洲还是在美洲，其他地方的城邦组织一般存在时间都很短，便很快地向统一的大规模的国家组织过渡。

至于希腊人在城邦中推行的民主管理制度，在人类管理史上也是很独特的。一般地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初期，从原始社会残留下来的原始民主制度或多或少总是会存在一段时间的，但总体而言，它是下行的而不是上行的，是趋于消亡而不是趋于发展的。唯独希腊的城邦民主，不但先后延续了5个世纪，而且还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究其原因，有人归之为希腊独特的地理条件：濒临地中海，地处多山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要的地理政治基础；靠近海洋，多数城邦可以直接通达大海而维持和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是城邦得以长期存在的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在此基础上，以工商业立国，人口大规模流动，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巨大发展，则是城邦实行民主政治的